

## 郑樵对文献学的贡献

李昭恂

郑樵，字渔仲，福建莆田人。北宋徽宗崇宁三年(1104)生，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卒，终年五十九岁。他博古通今、著述宏富，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。

郑樵早年住在福建的夹漈山中，专心致志地读书。他曾立下三个志愿：多读古人的书，尽通百家的学问，研究六经而成为它们的羽翼。他一生研究了极其繁富的文献资料，写下了一千余卷著作。他把自己的著作分为：经旨之学、礼乐之学、文字之学、天文地理之学、虫鱼草木之学、方书之学、讨论之学、图谱之学和亡书之学九大类。但是，他广博的著述，多数已失传；而至今保存完整的，只有一种：《通志》。

《通志》是郑樵贯通一生学问的著作。这部书博大精深，影响深远，堪称为文献学巨著。现在，我们从两个方面，来谈谈他对我国古代文献学的贡献。

第一、郑樵的《通志》是总辑之史的仅见者，它通古达今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。

郑樵的《通志》是总辑之史。讲总辑之史，应该提到梁武帝的《通史》和魏元暉的《科录》(这两部书，都已散佚)。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是仿梁武帝的《通史》。梁武帝命吴均等会通《史记》以下诸史而写

成一书，凡六百卷。自秦以上，都以《史记》为本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。两汉以下，则全录记传。通史的名字，起于会通诸史，也是总辑而为一书的意思。这与现在说的通史的意思不同。梁代的通史早就散佚了，郑樵发愤重作一部，名叫《通志》。为什么叫《通志》呢？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，……是以宋郑之史，皆谓之志，太史更志为记，今谓之志，本其旧也。”

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是一部工程浩大的著作。这是他一生学问的汇集，也是中国史学的巨著。据《通志·总目》载，帝后纪传二十卷，年谱四卷，二十略计五十二卷，列传记一百二十四卷，总计二百卷（从三皇到隋恭帝）。

郑樵的《通志》问世后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学术界议论纷纷。到清代，戴震说郑樵是陋儒，王鸣盛说渔仲是妄人。但章学诚则充分肯定了郑樵的成就。他在《申郑》中说：“郑樵生千载而后，……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；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”又说：“夫郑氏所振在鸿纲，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。”章学诚这些话，说出了《通志》的重要的价值。章学诚所说的“鸿纲”，就是“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；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。”所谓“别识心裁”，就是他在《释通》中说的：“总古今之学术，而纪传一规乎史迁，郑樵《通志》作焉。”因为能“总古今之学术”，所以章学诚肯定了《通志》。章学诚把《通志》和《通典》看做两类书：认为唐代杜佑的《通典》侧重典章制度；而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既重典章制度又兼重学术艺文。《通志》是在《通典》的启发下写出来的，其《礼》、《刑》、《职官》等略都是从杜佑的《通典》节录来的，而《通志》又超过了《通典》。可以说，《通志》是综合纪传志表各体，总括典章学术的一部通史。

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有哪些特点呢？章学诚在《释通》中谈通史的六个特点，我看都适用于《通志》。

一免重复。鼎革之际，人物事实，同出并见；董卓、吕布，范陈各为立传，这都是重复现象。而《通志》总合为书，事可互见，文无重出。

二均类例。在《通志》以前，类例不均。司马迁立天官，班固创地理，齐志天文，不载推步，《唐书·艺文志》不叙渊源。而郑樵著《通志》二十略，改变了史志章程，自成家法，会通前后而勒成一家。

三便铨配。通史包罗诸史，制度相沿，自后妃宗室，至于臣下，约略先后，以次相比。这样，子孙附于祖父，世家会聚宗支，一门血脉相承，时世盛衰，都可以见到。

四平是非。通史事隔数代，衡量是非较为公平。

五去抵牾。断代为书，各有裁制，详略去取，也不相仿，首尾交错，互有出入。因为通史统合为编，所以能去抵牾。

六详邻事。断代为编，各兄弟民族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，这样，就形成中朝典故居全，而蕃属载纪参半。惟有通史，才能做到南北统史，五代汇编。

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，郑樵的《通志》是继承了通史家风，分析研究了三千年来的文献，以他的别识心裁，成一家言。

第二、从横的方面看，郑樵通晓很多学科，他在文献学上的成就就是多方面的。

《通志》分四大部分：即帝纪、列传、年谱、略。在这四部分中，“略”写的最好、最突出。他自己和后来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都是这样看的。他在《通志·总序》中说：“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，名之曰《略》，凡二十略；百代之宪章，学者之能事，尽于此矣。其五略，汉唐诸儒所得而闻；其十五略，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。”

他所说的五略是：《礼略》、《职官略》、《选举略》、《刑法略》、《食货略》。这五略，用郑樵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虽本前人之典，亦非诸史之文。

他所说的十五略是：《氏族略》、《六书略》、《七音略》、《天文略》、《地理略》、《都邑略》、《谥略》、《器服略》、《乐略》、《艺文略》、《校讎略》、《图谱略》、《金石略》、《灾祥略》、《昆虫草木略》。这十五略的内容，大多数都是诸史志所不具备的。因此，郑樵说：“凡十五略，出臣胸臆，不涉汉唐诸儒议论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肯定二十略，说：“其（郑樵——作者按）平生之精力，全帙之精华，惟在二十略而已。”我认为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二十略的评价是正确的。郑樵的别识心裁，在二十略里有突出的表现。

章学诚在《申郑》中推崇《六书》、《七音》、《昆虫草木》三略。这三略，是写得不错，但可推崇的不仅是这些，郑樵的创造性还表现在许多方面。

比如《校讎略》，我认为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。它的内容十分丰富。关于图书分类，郑樵认为，精通类例，才可以保存图书。他在《编次必谨类例论》中说：“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。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。人有存没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……类例分，则百家九流，各有条理，虽亡而不能亡也。”事实说明，巫医之学和佛老之学，也都经过变故，为什么能常存呢？因为明类例。精通类例，就可以保存图书。类例可以明书，明书可以守学，守学可以传人，这个道理说得很深刻。

对于图书编目，郑樵批评班固把兵书《尉繚子》列入杂家类，是见名不见书；《崇文总目》把颜师古《刊谬正俗》列入论语类，是见前不见后，实际上《刊谬正俗》应当列入经解类。

他主张编次必记亡书，亡书应另列，可以本所系而求。这种做法是很好的。古书如果一时亡去，可能是受耳目之限。假设将亡

书另列,不但不致与现存书混淆,又可使后人作考证之用。郑樵批评唐人收书,只记其有,不记其无,致后人失其名系。

他重视求书和校书,主张求书和校书都要设专官,而且使其久任。并且,提出著名的求书之道八论:一曰即类以求。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;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。二曰旁类以求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;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。三曰因地以求。《孟少主实录》蜀中必有;《王审知传》闽中必有。四曰因家以求。《钱氏庆系图》可求于忠懿王之家。五曰求之公。礼仪之书,词祀之书,断狱之书,官制之书,版图之书,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,其书必有存者。六曰求之私。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。七曰因人以求。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,其家或有田氏之书,他尝见其《荆州田氏书目》。八曰因代以求。书之难求者,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;若出近人之手,何不可求之有!郑樵认为,国家图书馆要丰富馆藏,必须千方百计地广为征求。他的求书八法,是针对国家图书馆提出的。它不仅对宋代的图书馆建设有帮助,而且对以后的图书馆建设和公私藏书家都有深刻影响。

《校雠略》的这些重要意见,都是郑樵对我国图书馆学,尤其是对校雠学、目录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。

比如,《艺文略》,是二十略具有创造性的又一表现。他主张图书分类和编目的最大作用,是能做到“辨章学术,考竟源流”。为了实践他自己的主张,他撰写了《艺文略》。

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创立了精密的分类体系,包括十二类、百家、三百七十一一种。十二类是:经类第一,礼类第二,乐类第三,小学类第四,史类第五,诸子类第六,天文类第七,五行类第八,艺术类第九,医方类第十,类书类第十一,文类第十二。这是第一级类目。第二级类目是从类分出来的,叫作家,如经类分为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国语、孝经、论语、尔雅、经解等九家。第三级类目叫

作种,是由家分出来的,如易分为古易、石经、章句、传、注、集注、义疏、论说、类例、谱、考正、数、图、音、讖纬、拟易等十六种。由于他对目录分类有深入的研究,所以他的分类体系考虑的十分周密。他在《校讖略·编次必谨类例论》中说:“《易》本一类也,以数不可合于图,图不可合于音,讖纬不可合于传注,故分为十六种。”这就说明,《易》所以要分为十六种,是因为他对《易》做了具体分析,看到了种与种之间的差别,所以他敢于冲破我国古代《汉志》、《隋志》等的两级分类体系,突破了《新旧唐志》、《崇文》的四分、《中经》的五分、《隋志》的六分、《七录》的七分、《七志》的九分等方法,创立了新的三级分类体系。

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书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收录了各种图书三十八种,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。而郑樵的《艺文略》广收古今典籍达一万零九百一十二种,十万一千零九百七十二卷。郑樵想包括古今,备录无遗。虽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,但他收录图书的广泛程度也大大超过前人。

在古代文献中,注意采集金石之文,也是由他创始的。他所以作《金石略》,就因为他认为“金石之功,寒暑不变,以此稽古,庶不失真。”在《金石略》里,他专采三皇五帝的泉币、三王的鼎彝、秦人石鼓、汉魏丰碑,上自苍颉石室之文,下逮唐人之书,各列其人而名其地。他提出金石器物在史学上的作用,认为以金石稽古,真实可信,并且,“各列其人而名其地”,这是多么卓越的见识啊!

他认为,图谱之学是一种实学,不象义理、辞章之学的着重语文。为学或者从政,图与书都不能偏废。关于天文、地理、宫室、器用、车旗等,如果有书无图,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他赞扬任宏校兵书的收图四十三卷,王俭撰《七志》的以一志专录图谱;而批评刘向父子的只收书不收图和《隋志》以后各志不著录图谱。在他自己编撰的《艺文略》中,如经类的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尔雅各家,礼类

的周官、丧服、会礼各家，史类的职官、地理各家等，都收了图，而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丧服各家，都录了谱。他所撰的《图谱略》不但编制的体例有独到之处，而且所阐述的图谱学原理也都远远超过前人。

从前的氏族书是很模糊的，而他的《氏族略》却分成三十二类，条理分明。

上面提到的，只是一部分事例。仅仅这些事例就足以说明，郑樵在文献学上有广泛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诣。

郑樵这些做法，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。郑寅的《七录》是在郑樵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，焦竑撰《国史经籍志》的一些子目大体是根据郑樵的分类体系的。章学诚的《校雠通义》发扬了郑樵《校雠略》的精神。清乾隆敕修《续通志》和《清朝通志》，仍然沿袭郑樵的体例。因为郑樵《通志》的纪传迄于隋，所以《续通志》的纪传起唐，诸略起五代宋，纪传和诸略等都迄于明末。诸略都是续郑樵的，郑樵没有的做了补充，已有的做了正误，如郑樵的《艺文略》，有光列书名卷数的，《续通志》又补了撰人爵里。

郑樵在文献学上的重大成就，是由于他刻苦努力的结果。他在《通志·天文略序》中曾说过他学天文的经过：“天文籍图不籍书，……图一再传便成颠错，……臣向尽求其书，不得其象，又尽求其图，不得其信。一日，得《步天歌》而诵之，时素秋无月，清天如水，长诵一句，凝目一星，不三数夜，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。”他在《通志·昆虫草木略序》中也说过他学动植物的经过：“臣少好读书，无涉世意，又好泉石，有慕弘景心。结茅夹漈山中，与田夫野老往来，与夜鹤晓猿杂处。不问飞潜动植，皆欲究其性情。”他这种不空谈、重实践的精神，既认真读书，刻苦钻研，又亲自实践，注意实地调查的精神，是科学的，也是很可贵的。他注重实践，注意从实物上发现学问，不专从书本里钻研字句，反对死守书本来谈名物，

这种研究精神是很可取的。

一分为二来看,郑樵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。比如,郑樵重视图谱,单独写了《图谱略》,这是一大贡献。但他的《通志》,包括《图谱略》,没有一张图,致使《图谱略》著录的图都失传了。再比如,从学术上分类,可以“互著”。由于郑樵不明白“互著”的道理,所以,《艺文略》的经部著了石经,《金石略》里就没有石经了。这也是缺欠。这些,和成就相比,是次要的。因此,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的成就。

### 《茶经》的版本

陆羽的《茶经》是研究我国古代茶叶科学的宝贵遗产。原书图文并茂,流传版本甚多。有新安汪士贤校刊本、明刊吕氏十种本、明孙大绶刊本、明晋安郑允荣校本、明华氏刊本、明刊一卷本、百名家书本、照旷阁刊本等,以汪士贤校刊本为最早。收入“丛书”类的有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唐宋丛书》本、《格林丛书》本、《说郛》本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本等,以明翻宋的《百川学海》本为最先。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明代汪士贤校刊本,以及固始吴其浚著、蒙自陆应谷校刊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。这些都是《茶经》的善本。

· 孙定焕 ·